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老年学者文库

谭家健
著

中华古今骈文通史

(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老年学者文库

中华古今骈文通史

谭家健

著

(下)

SSAP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古今骈文通史：全2册 / 谭家健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ISBN 978 - 7 - 5201 - 3259 - 6

I. ①中… II. ①谭… III. ①骈文－诗歌史－中国
IV. ①I207. 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80911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中华古今骈文通史（上下册）

著者 / 谭家健

出版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李建廷

责任编辑 / 李建廷 王小倩

出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sp.com.cn

发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72.25 插页：0.5 字数：1138 千字

版次 /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 - 7 - 5201 - 3259 - 6

定价 / 468.00 元（上下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 - 59367028）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下 册

第八章 清代：骈文之“中兴”与衰落	553
第一节 清代骈文概说	553
一 清代骈文的发展阶段	554
二 清代骈文理论批评	556
三 清代的骈文评论专著和骈文选本	565
第二节 清前期骈文	570
一 清初之明遗民骈文	571
二 顺治至康熙中期骈文	577
三 康熙后期至雍正之骈文	585
第三节 清中期骈文	593
一 乾隆时期骈文	593
二 嘉庆至道光前期骈文	615
第四节 清后期骈文	622
一 道光后期至同治时期骈文	622
二 光绪宣统时期骈文	629
清代骈文选读	645
袁枚《上尹制府乞病启》	645
洪亮吉《游天台山记》	648

汪中《自序》	651
王闿运《秋醒词序》	656
第九章 现当代：骈文之余波	661
第一节 现当代骈文概说	661
第二节 民国时期骈文	663
一 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后之骈文	663
二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全面抗战前之骈文	680
三 全面抗战至四十年代之骈文	690
第三节 当代骈文述略	693
一 已出版专集的骈文作者	694
二 其他骈文作者	719
第四节 台湾、香港骈文	726
一 台湾骈文	726
二 香港骈文	740
现当代骈文名篇选读	753
饶汉祥《致全国父老书》	753
成惕轩《山房对月记》	754
饶宗颐《世说新语校笺》序	759
魏明伦《绿杨村记》	761
曲冠杰《楚辞研究的一方沃土》（节录）	763
外编 域外骈文创作	766
第一节 域外骈文概说	766
第二节 新罗、高丽之骈文	775
一 新罗时期骈文	777
二 高丽时期之骈文	786
第三节 朝鲜王朝之骈文	797
一 朝鲜王朝前期骈文	798
二 朝鲜王朝后期骈文	810

第四节 日本骈文（上）	821
一 飞鸟朝骈文	823
二 奈良朝骈文	827
三 平安前期骈文	833
第五节 日本骈文（下）	842
一 平安后期骈文	843
二 镰仓至江户时代骈文	860
第六节 越南骈文（上）	864
一 李朝骈文	867
二 陈朝骈文	873
三 后黎前期的骈文	880
第七节 越南骈文（下）	889
一 南北朝（后黎朝后期）骈文	889
二 西山王朝和阮朝骈文	900
三 越南民间骈文	907
第八节 新加坡、马来西亚之骈文	913
一 早期新马骈文	914
二 近代新马骈文	917
三 现代新马骈文	928
四 当代新马骈文	935
第九节 泰国、印度尼西亚骈文举隅	945
一 泰国骈文举隅	945
二 印度尼西亚骈文举隅	950
附 文莱现代骈文一则	958
域外骈文名篇选读	960
新罗·崔致远《西川罗城图记》	960
日本兼明亲王《山亭起请》	963
越南陈太宗《戒色文》《戒酒文》	964
新加坡·黄勣吾《黎国昌天香书屋唱酬续集序》	965

附录一 百年来骈文研究论文分类索引	967
附录二 百年来骈文论著及选本简介	1057
附录三 台湾、香港之骈文论著、选本简介、论文索引	1088
附录四 日本报刊骈文研究论文索引	1109
附录五 韩国及东南亚之报刊骈文研究论文索引	1122
《中华古今骈文通史》项目总结报告 代后记	1130

第八章

清代：骈文之“中兴”与衰落

第一节 清代骈文概说

清代骈文在中国骈文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时期的繁荣，有人称之为“中兴”，有人称之为回光返照，但其地位是无法与鼎盛的南北朝、初盛唐、新变的宋代骈文相比的。其延续到清末，至民国二三十年代便与古文一道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了。

清骈区别于元明者有四。一是出现了大批优秀的骈文作家作品。叶农、叶幼明说：“清代写作骈文的人数之多，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与之比拟。”^① 骈文专集和单篇骈文数量之多，也无法精确统计。二是流派众多，各具特色，写作艺术超过元明。以时代分，有魏晋派、六朝派、三唐派、宋四六派；以体格分，有清俊、矜练、博丽、圆熟等派；以地域分，有常州派、仪征派等。三是引发了骈散大辩论。中唐和北宋两次古文运动，骈文家只是受批评，罕见反驳。清代骈文家主动挑战，称古文只是“语”，骈文才是“文”，以文章正宗自居。四是清骈虽盛，但内容更狭窄，形式无新变。叶农、叶幼明说：“清代骈文内容之狭，比之元明，有过之而无不及。作品虽然众多，但是不过歌颂升平，应酬交接，偶然徜徉山水，自适皋壤而已。其能稍

^① 叶农、叶幼明：《中国骈文发展史论》，澳门文化艺术学会2010年版，第157页。

微反映一点现实或抒发一点个人牢骚者，则百无一二焉。”^① 姜书阁说：“即就世所盛称的清代复兴骈文的骈文家而论，究竟有谁是超出六朝、唐、宋骈俪或四六而有所独创呢？没有，绝对没有。那么，又如何谈得到复兴呢。”^②

清代骈文虽然没有初盛唐那样广泛影响全社会，也没有出现宋代那样划时代的新变，然而相对于辽金元明骈文之低潮，清骈无疑达到一个历史的新高度。作家形成地域性、家族性群体，作品被大量集结、选评，艺术水准达到新的高度。清骈比较少见南宋骈笺和明代骈启那样俗套泛滥，令人生厌，而以其短小活泼的书信、序跋、箴铭、杂记等充满审美意趣的个性化作品，为上层文化人士所欣赏。读者群体虽然较小，艺术品位却相当高雅。这些也许就是清骈的历史特色所在。如果没有质量仅有数量，是无法称之为“复兴”的。

清代骈文为何能出现短期繁荣？从政治社会环境看，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社会逐渐稳定，经济较为繁荣。统治者一方面大兴文字狱，镇压知识分子，一方面设博学鸿词科，开《四库全书》馆，笼络学者文人。在这种情势下，有些文化人避开现实政治，把心血用在整理和研究传统文化典籍方面，以实现自身价值，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所谓朴学或曰汉学，而与重义理之宋明理学、心学相区别。从文化心态氛围看，明人喜欢空谈心性，往往束书不观，师心自用，乐散文之简易，惮骈文之繁复。清代的汉学重视考据、训诂、文字、音韵等，强调学有本原，以熟记典故为博雅，以古奥精巧相矜尚，骈体文正好可以展现其才智。清代不少汉学家同时也是骈文家，而古文家则颇倾向于宋学，被骈文家讥为疏浅。康熙年间，出版了诸如《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等检索文章典故的大型工具书，为骈文写作提供了方便。造成清代骈文高潮的原因还很多，上述情况应该算是主要的。

一 清代骈文的发展阶段

清代骈文的发展大致可分三阶段。

① 叶农、叶幼明：《中国骈文发展史论》，澳门文化艺术学会2010年版，第159页。

② 姜书阁：《骈文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30页。

第一，清前期：顺治、康熙、雍正，约九十年，是始盛期。

首批清初骈文家是明遗民，政治倾向鲜明，但文坛影响不大。稍晚的骈文家，多生于明而长于清。晚明骈文复苏时，这些年轻人受当时风气习染，与明末骈文家或有交往，或受指教。清初骈文成就最大的是陈维崧和毛奇龄。同期的骈文家还有毛先舒、吴兆骞、陆繁弨等。他们虽与遗民之痛恨清廷有所不同，但也经历了江山易代的巨变，于是，家国兴亡破败之悲，身世颠沛流离之痛，常吐露于笔端，即使不写这方面的题材，亦志深笔长，感慨多气。稍后的章藻功等，政治态度和文章内容较前辈逐渐变化。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说：“清初骈文家当推毛西河（奇龄）、陈其年（维崧）。西河不以骈文名，而所作颇合六朝规矩。其年骈体，本与江都吴绮园次，钱塘章藻功岂绩，并有声誉。然园次才弱，岂绩欲以新巧胜二家，又遁为别调。其年导源庾信，才力高健。园次追步李义山，岂绩纯用宋格。”

第二，清中期：乾隆、嘉庆至鸦片战争以前，约一百年，是全盛期。

这时大规模战争基本上结束，偃武修文，学术文化氛围越来越浓。汉学大盛，取得了喜人的成就。汉族文化人对清廷的态度逐渐软化，由对抗转化为合作，少数文化人仕宦显达，成为重要学术领军人物。如纪昀、毕沅、彭元瑞、阮元、梁章钜等，内而尚书、大学士，外而巡抚、总督，他们的影响力自非一般作家可比。谢无量说：“及乾嘉之世，四方无事，在上者多方以励文学，士人研精考索，遂往往好为沉博绝丽之文。自乾嘉以来，以骈文传者，不啻数十百家，极一时之盛。于是清之骈文，其高者率驾唐宋而追齐梁，远为元明所不逮。”^①

清中期著名骈文作家有胡天游、杭世骏、袁枚、刘星炜、邵齐焘、汪中、吴锡麒、洪亮吉、孔广森、孙星衍、恽敬、刘嗣绾、方履篯、彭兆荪、董基诚、祐诚等。杰出者公认是汪中、洪亮吉。这批人中有不少是汉学大师，有的兼擅骈散。各家特色越来越显著，堪称鼎盛气象。

第三，清晚期：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约七十年，属衰落期。

列强入侵，国门大开，连连丧权辱国，面临瓜分之势。太平军席卷大半个中国，捻军横行中原，回民暴乱西北，阿古柏分裂新疆，清王朝在风雨飘

^① 《谢无量文集》第七卷《骈文指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3页。

摇中挣扎。思想文化方面，西学东渐，首先是自然科学，继而社会科学，进而有文化艺术。一系列新的文化元素给中华传统文化带来严重冲击。紧跟历史潮流的是散文家，最早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相继是洋务派、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所用文体，首先是桐城派，而后是其支派湘乡派、侯官派，再后是新变的报章体、新民体。热心救亡图存的志士们已经少有心思写那种不切实用、雕章琢句的骈体文了。这时骈文较清中期明显被冷落了，但也还存在。叶农、叶幼明说：“这时的骈文起了如下变化。一是骈文的重心由江浙转向沅湘，集中到曾国藩幕下；一是鸿篇巨制减少，而多为短篇；一是弃博丽而尚轻倩。”^①

著名骈文作家有：梅曾亮、金应麟、谭莹、周寿昌、俞樾、李慈铭、王闿运、谭献、张之洞等。还有少数骈文作者的创作活动延续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本书将在“民国骈文”一节中另做介绍。

二 清代骈文理论批评

吕双伟认为：“乾嘉道时期完成了骈文地位的完整论述，即与古文求对等地位，和古文争文坛正统，以及整合骈散奇偶不拘三部分。这些内容不是在时间上有截然分开的先后顺序，而是彼此同步或交叉出现，不过在不同时期论述的内容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② 求对等、争正统、融骈散也是整个清代骈文批评的三要素，虽然互有交叉，但大致符合清代骈文理论批评的发展顺序。

顺治年间，骈文批评较为冷清，康熙年间逐渐活跃。有人继承晚明遗风，继续编四六选本，作为写作范式；有人张扬骈文的独立性，将之与古文并列；有人对清初骈文家陈维崧等开展积极的推荐性评价；但仍然有相当多的文人对骈文尤其是六朝骈文持否定或轻视态度。

康熙皇帝提倡文以载道，青睐古文。他指示大臣徐乾学编《古文渊鉴》并为之作序。他还讲过：“文章贵于简当，可施诸日月。章奏之类，亦须详明简要。明朝典故朕所悉知，其奏疏多用排偶芜词，甚或一二千言，每日

^① 叶农、叶幼明：《中国骈文发展史论》，澳门文化艺术学会 2010 年版，第 165 页。

^② 吕双伟：《清代骈文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24 页。

积藏几案，人主讵能尽览！”（《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

康熙、雍正时期重臣张廷玉的《古文雅正序》说：“昔人之论古文也……究之辞命、议论、论事，莫不贯于理。唯贯于理，则内有以关乎身心意知之微，而外有以备乎天下国家之用。故夫性命之文，约而达，赡而精，奥博而有体要。他若俶诡幻怪，卮词蔓衍，与夫月露风云，连篇累牍，大雅弗尚也。”“他若”指的就是古文之外的骈文。其观点和语言与隋代李谔相近。清初古文家侯方域、吴伟业、朱彝尊、戴名世等皆轻视骈文。

清初有人编四六选本为骈文争一席之地。如黄始编《听嘤堂四六新书》及其广集，将古文与骈文视为同一层次，虽有主次之分，但无高低贵贱之别。这有利于当时骈文创作地位的提高。但应该看到，相对于同时期大量出现的古文选本，清初骈文选本的影响是很小的。

陈维崧（1625~1682）是清初骈文创作大家，在骈文批评方面也很有地位。他对当时文坛轻视骈文的现象不满。其《词选序》说：“客或见今才士所作文，间类徐庾俪体，辄曰：‘此齐梁小儿语耳！’掷不视。是说也，予大怪之。”他认为，徐庾之作中有堪与庄骚左国史汉比美的佳篇。“天之生才不尽，文章之体格亦不尽”，应当允许作家各据所长选择文体，不能强求一律。在《陆悬圃文集序》中，他指出骈文散文的不同特征：“一疏一密，既意隔而靡宣；或质或文，复情睽而罕俪。然而诸家立说，趣本同归；百氏修辞，理惟一致。倘毫枯而腕劣，则散行徒增鄙冗之讥；苟骨腾而肉飞，则俪体讵乏惊奇之誉？原非泾渭，讵类玄黄？”认为骈散原本相辅相成，殊途同归，不应对立。

毛际可（1633~1708），顺治进士，与毛奇龄、毛先舒齐名。在《陈其年文集序》中，他自述最初怀疑和否定骈文，觉得模式固定，千篇一律，后来读了陈维崧的骈文，改变了看法。“余偶披篇首，已见其棱棱露爽；继讽咏缠绵，穷宵达昼。言情则歌泣忽生，叙事则本末皆见。至于路尽思穷，忽开一境，如凿山，如坠壑……为之舌翹而不能下。始悟文之有骈体，犹诗之有排体也。”二十年后，他在《汪蓉洲骈体文序》中，概述他对骈文源流的见解。他认为东汉六朝是高潮，唐初北宋“风韵渐减”，明代“陈陈相因”，清代“骈体之工，无美不备”，自陈维崧一出，“觉此中别有天地”。可是，“比来模拟相寻，久习生厌”。他试图对骈文创作历史经验做出梳理。

吕双伟指出：“尽管陈维崧、吴绮等人的骈文创作取得了很大成就，当时的骈文理论也多次张扬骈文的正常地位，但直到康熙末年，骈文和古文对等的观念在文人中还没有普遍树立起来，骈文仍然受到轻视。”他又说：“面对这种歧视，当时的骈文家不得不从经史中追溯骈体源流，以争取其正常的文体地位。到嘉庆中后期，随着骈文创作自身的繁荣和汉宋之争在文学上的激化，倾向于骈文的作家们不甘心只为骈文取得和古文的对等地位，转而改变自中唐以来的古文文统之说，否定古文正宗说，否定古文为‘文’说，倡导骈文才为文章正宗。自嘉庆末到道光年间，随着汉宋学术的交融和对骈文、古文特征的全面认识，文学上走向骈散交融。这种交融主要不是机械地独立地将骈文和古文分开，平等对待，而是主张在文章中将对句和散句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拘骈散，以文意和文气为指归。这种思想贯穿于后来同光年间，成为晚清骈散创作及评论的主流。”^① 这段话概括了乾隆以后骈文理论批评的大趋势。

袁枚（1716～1797）是古文名家，却不赞成桐城派。他对骈文的见解，有四点值得注意。一是批驳骈文无用论，肯定骈散各有所宜。其《答友人论文书》说：“足下之答绵庄曰：‘散文多适用，骈文多无用，《文选》不足学。’此又误也。”袁枚认为，早先骈散相杂，无所谓骈文无用。后来骈散分开，是时势使然，与有用无用无关。评价文章不必以适用为贵，应将满足审美要求放在突出地位，而这正是骈文所长。二是否定唐宋八大家之说，否定古文文法，肯定骈散各有利弊，不得重古文而轻骈文。其《书茅氏八家文选》批评茅坤没有全读唐宋两朝文，仅就其所见所知撮合八家，其中有的人（如苏洵、苏辙、曾巩）根本成不了家。三是否定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认为六朝之文固未尝衰。四是主张骈散合一。“一奇一偶，天之道也。有骈有散，文之道也。文章体制如各朝衣冠，不妨互异。其状貌之妍媸，固别有在也。”这些观点有重要影响。

孔广森（1752～1786），著名骈文家，他对骈文体制有清醒的认识。既看到长处，也承认短处。他说：“六朝文无非骈体，但纵横开阖，一与散体文同也。”“骈体文以达意明事为主，不尔则用之婚启，不可用之书札；用

^① 吕双伟：《清代骈文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5、125页。

之铭诔，不可用之论辩，直为无用之物。”（孙星衍《仪郑堂遗稿叙》引）承认骈文可能成为“无用之物”，这是很有眼光的见解。

彭兆荪（1768～1821），曾对骈文史深入分析，其《荆石山房文序》说：“文章骈格，咸谓肇始东京。……由质趋文，势有必至。马扬而后，益事增华，俪偶之兴，实基于此。爰逮魏晋，以迄陈隋，众制蜂起，雅材弥劭。有唐一代，斯体尤崇。颖达以之叙经，房乔以之论史。其于散著，途异源同。昧者不察，目为卑滥，是盖末流之放失，以致伪体之滋繁。”强调骈散同源而异途。并要求骈文做到：“义归于渊雅，词屏于哗嚣，侔色于敦彝，含音乎琴瑟。斟酌华实，逖远淫哇，作者抗行，良无愧矣。”他这样讲，目的是提高骈文创作的思想品位，以便使其与古文并居文坛正宗地位。

曾燠（1760～1831），善骈文，选编《国朝骈体正宗》，其序文说：“夫骈体者，齐梁人之学秦汉而变诸。后世与古文分而为二，固已误矣。”“古文丧真，反逊骈体。骈体脱俗，即是古文。迹似两歧，道当一贯。”曾燠并不想故意抬高骈文地位，而是承认骈文有种种弊端，“飞靡弄巧，瘠义肥辞”，“活剥经文，生吞成语”，是比较中肯的批评。

乾隆中后期，骈散调和论越来越多，到道光中期成为文章创作的主流。古文家一方面尊宋学而重义理，一方面重训诂而不轻考据，讲辞章而求博学，兼容而不排斥骈文，王芑孙、方履篯、梅曾亮、陆继辂等，率皆如此。

乾嘉时期甚至整个清代，对骈文地位和骈散关系见解最偏激者是阮元。

阮元（1764～1849）是清代学术文化史上的巨人，26岁中进士，仕途显达，历任兵、礼、户部侍郎，浙江、河南、江西巡抚，两广、湖广、云贵总督，以体仁阁大学士致仕，高寿86岁。他很早就提出禁鸦片整海防以备外侮。在各地方任上，他组织编辑刊刻大量巨型丛书，包括经学、史学、文学、考古学、自然科学，并在杭州、广州办学堂，培养学术人才。对于这样的学术大师，虽要敬重，但也不必为贤者讳，阮元的骈文观点是不能成立的门户之见。

阮元极力为骈文争夺正宗地位，作《文笔考》《文言说》《文韵说》等文，把古文彻底排斥在文统之外，连“别调”也不是。他以考据家的姿态，找出六朝“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一些资料，提出文必有韵，文必有偶的说法，断定骈文才是文，古文是笔而非文。他说：“凡文者，在声为宫商，

在色为翰藻。”“今人所便单行之文，极其奥折奔放者，乃古之笔，非古之文也。”（《文韵说》）“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所谓文也。”为了对抗古文文统，他拟定了骈文文统，认为六朝《文选》之文、唐宋四六文、明清八股文才是文章正宗。孔子所作《易》之《文言》，是千古文章之祖，也是骈文之祖。此外，“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名之为文也”，把唐宋八大家排除在“文”之外。（《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他组织学生和儿子用命题考试作文的方法为他助威。于是文笔之辨、骈散之争激烈展开，从晚清延续到民国，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更多。

方东树（1772～1843），桐城人，姚门弟子，曾任阮元幕宾，主张禁鸦片，御外侮，图自强，著有《汉学商兑》，其中对骈文正统论有尖锐批评。“所谓专门汉学者，由是以及于文章，则以六朝骈俪有韵者为正宗，而斥韩欧为伪体。……扬州汪氏谓文之衰自昌黎始。其后扬州学派皆主此论，力诋八家之文为伪体。阮氏著《文笔考》，以有韵者为文，其旨皆如此。”方东树说他们是“无目而唾天”。

刘开（1784～1824），姚门弟子，桐城人，他有两篇文章专谈骈散。一篇是《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认为古文骈文各有优劣长短，主张不分骈散，提倡互融。“骈之与散，并派而争流，殊途而合辙。”“骈中无散，则气壅而难疏；散中无骈，则辞孤而易瘠。两者但可相成，不能偏废。”“宗散者鄙俪词为俳优，宗骈者以单行为薄弱，是犹恩甲而仇乙，是夏而非冬也。”“骈散之分，非理有参差，实言殊浓淡……一以理为宗，一以辞为主耳。”意见较为公允。另一篇是《与阮芸台（阮元）宫保书》，作于阮元任两广总督时，正是骈散争论激烈之际。针对阮元的骈文正统论，刘开从先秦两汉、唐宋八大家到明代唐宋派的古文传统以及方苞的继承与发展这些方面，做出系统的阐述，主张“以汉人之气体，运八家之成法，本之以六经，参之以周末秦诸子”。他反驳对韩愈的攻击：“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也。”在文宗问题上他并未妥协，而是坚持在古文正统基础上给骈文一定地位。

晚清邓绎《藻川堂谭艺·三代篇》说：“阮氏芸台尊训诂，为校勘记而抑古文辞诸家，贵偶贱奇，偏举《易文言》之偶韵以为之说……尤为固陋，而举世不悟其非，故嘉道以来文辞之能自树立者鲜矣。”

民国初年，章炳麟作《国故论衡》，其中《文学总论》批评：“阮元之徒，猥谓俪语为文，单语为笔。”章氏举出六朝时人也称任昉、徐陵之文为“笔”，难道他们写的不是骈文吗？可见阮氏的文笔考是以偏概全。

继续批评者尚多，如王肇《文笔说》、胡怀琛《文笔辩》、王利器《文笔新解》、逯钦立《说文笔》等。20世纪五十年代，郭绍虞《文笔与诗笔》指出，“文是文笔或诗笔的共名，即押韵者为文，不押韵者为笔。而当时不押韵脚的骈文实为笔而非文”，认为阮之文笔说不免穿凿附会，与骈散之分并无直接关系。

黄保真、成复旺、蔡钟翔合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对阮元提出批评：“他就这样一股脑儿取消了唐宋以来古文作为文的资格，就否定桐城派标榜文统而言，当然来得十分彻底。但是他却一笔抹杀了近千年散文发展的历史事实，这样的否定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中也无助于推动文体改革。如果用这样的理论来指导的创作，则完全是开历史的倒车。”“至于阮元为骈文力争正统，在理论上更没有什么价值了。”^①

吕双伟指出，阮元关于“文”的一系列论述，核心是强调“文”的音韵和对偶，是走向今天所谓的形式主义。一方面有浓重的复古性，一方面也是针对当时的经史子为文的实践和理论。他把八股文归为文章正宗，其偏颇显而易见。^②

咸同年间，骈文淡薄，古文复盛。光绪时期，骈文略有起色。整个晚清的骈文理论批评较之中期大为逊色，而其中的佼佼者当首推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是晚清时期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在其事功成就之前已有文名，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学术地位也日益提高。他兼容汉宋，兼擅骈散，宗桐城而有所突破。在姚氏义理、考据、辞章之

^① 参见黄保真、成复旺、蔡钟翔《中国文学理论史》第七编第二章第一节《阮元的〈文言说〉和李兆洛、蒋湘南的骈散合一论》，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吕双伟：《清代骈文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136、137页。

外加上经济，把阳刚阴柔的美学标准加以细化。他不赞成阮元诸多观点。曾氏依姚氏《古文辞类纂》体例，编《经史百家杂钞》，包括先秦、两汉、六朝、唐宋，明代只取归有光，清代只取姚鼐，基本上是桐城派的文统，所不同的是不排斥六朝。该书《题语》说：“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录古文，不复上及六经，以云尊经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弃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于三代两汉。今舍经而降以相求，是犹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将可乎哉！”《经史百家杂钞》所选内容广泛，经部包括五经之文，子部有《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淮南子》等，史部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唐书》《资治通鉴》，六朝文中有许多骈体文。该书既有别于当时众多的古文选本，同时也是用事实对阮元的“经史子非文”的反驳。他把散文的外延大大扩张，符合中国散文史的实际情况，是相当通达的散文观。近半个多世纪来的古代散文选本大多依循曾氏的选文范围。

在《湖南文征序》中，曾氏深入阐发骈散各有所长，骈宜于抒情，散长于说理的论调。“自群经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胜。以理胜者，多阐幽造极之语，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胜者，多悱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丰缛而寡实。自东汉至隋，文人秀士，大抵义不孤行，辞多俪语，即议大政，考大礼，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历唐代而不改。虽韩李锐志复古，而不能革举世骈体之风，此皆习于情韵者类也。宋兴既久，欧苏曾王之徒，宗奉韩公，以为不迁之宗。适合其时，大儒迭起，相与上探邹鲁，研讨微言。群士慕效，类皆法韩氏之气体，以阐明性道。自元明至圣朝康雍之间，风会略同，非是不足与于斯文之末，此皆习于义理者类也。”他把骈散的历史发展平等看待，而且揭示出宋以来散文兴盛与儒家理学大师迭起有关。清代文人概述骈散历史者甚多，曾国藩此论是比较深刻、全面的一篇。黄保真三位的《中国文学理论史》说：“他这样来论述文章发展的历史，就一举打破了宋代以来古文家所严守的壁垒，不仅在内容上兼重情理，而且在形式上融会骈散了。这一来长期解决不了的骈文与散文之争，明理与抒情之争，都变得没有必要了。”^①

^① 参看黄保真等《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七编第二章第二节“姚门弟子与曾国藩的古文理论”，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